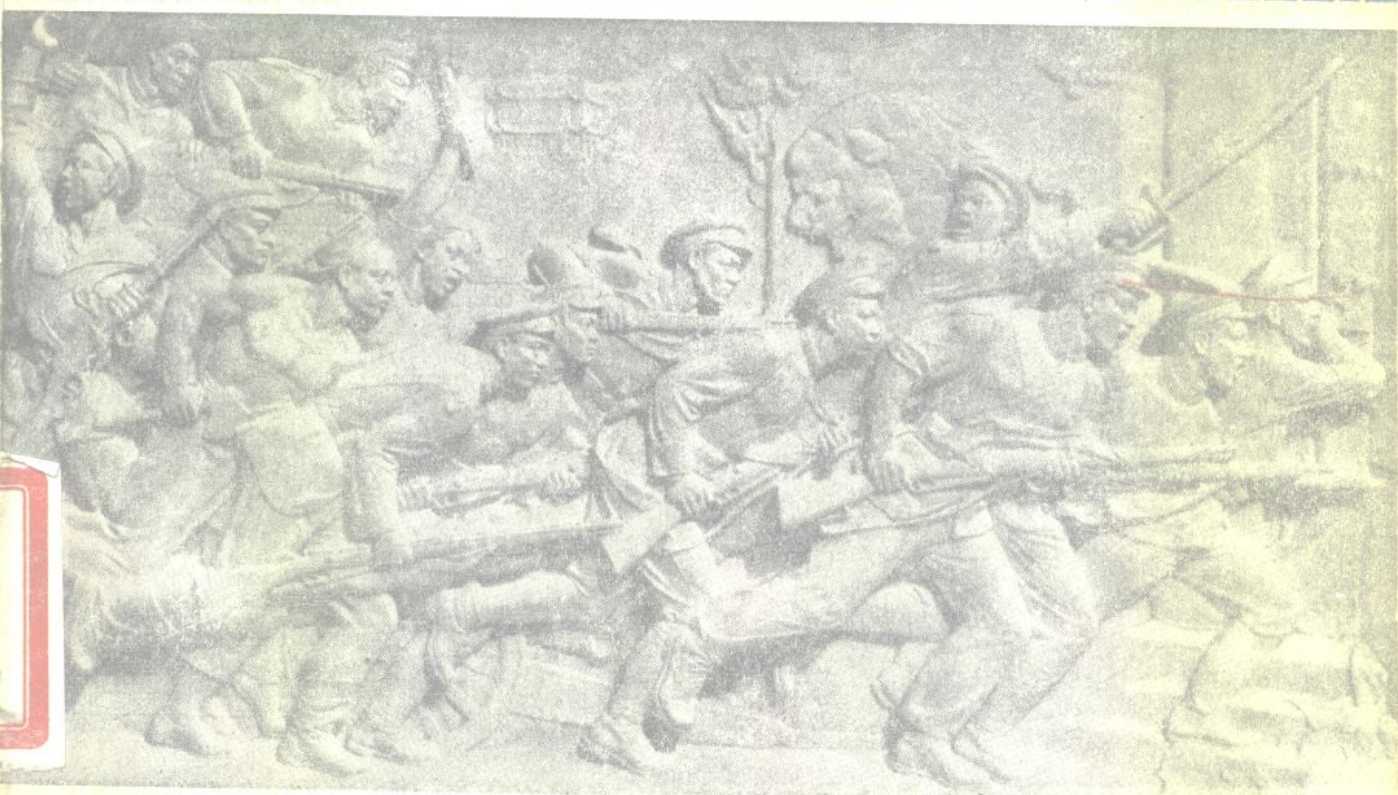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二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编

XINHAIGEMINGSHI CONGKAN



中华书局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二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二辑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15 印张·323 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统一书号：11018·904 定价：1.40 元

编 者 的 话

本刊是一个不定期的学术集刊，由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辑，目的在于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和刊载历史资料的园地。

凡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文、考订、史料、图片、年谱、回忆录、译文、书评以及学术动态等，欢迎投稿。来稿字数多少不拘，如篇幅较长而又确有价值者，可以分辑连载，或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丛书》出版。

来稿请写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发表时的署名，邮寄“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转《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由于本刊无专职工作人员，来稿务希缮写清楚，并认真核实引文，以免增加发稿和校对时的困难。

本刊尚属草创阶段，编辑工作缺乏经验，错误与缺点在所难免，希望广大作者和读者随时批评指正，并且不断给予大力支持。

《辛亥革命史丛刊》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录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张 磊 (1)
论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韦杰廷 (21)
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	汤志钧 (37)
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	林增平 (48)
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	
——三论郑观应	夏东元 (62)
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	王天奖 (74)
沙俄与辛亥革命	吴乾兑 (84)
史坚如及其供词、绝笔考辨	赵矢元 (96)
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解	唐文权 (107)
“黄兴乙巳回乡历险”订谬	毛注青 (112)
黄兴与宫崎寅藏	毛注青 (115)
辛亥革命前东北人民自发斗争述略	孙克复、关捷 (122)
“蒲案”始末	
——记 1908 年陕西蒲城一次学生运动	张应超 (132)
犬养毅遗物中的一封孙中山手札	(138)
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	
致柏原文太郎等的十三封信	(141)
辛亥严复致陈宝琛书	(150)

回忆辛亥.....章天觉手稿 (154)

蜀党史稿.....熊克武等撰 (167)
张 颐眉批

革命运动还是流血事件

——潮汕地区与辛亥革命.....[美]爱德华·弗里曼作 陶宏开译 (183)

“革命瓜分论”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保皇派与革命派的争论

.....[日]寺广映雄著 王富山、吴雁南译 邹念之校订 (200)

日本有关孙文文献目录.....[日]野泽丰编 饶怀民、赵军译 王宏吉校 (211)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张 磊

(一) 引 言

作为革命先驱者和民主主义战士，孙中山为了指导革命运动曾经辛勤地探求和熔铸着理论武器。他热切地向西方的“新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学习，批判地吸收中国古典哲学的优良成分，并且不懈地概括革命实践，从而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乃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社会政治、经济观点的理论基础，在它上面矗立着他的民主主义政纲——三民主义。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对于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致成为这一哲学思想——特别是它的自然观的基石。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孙中山早在少年时代就摆脱了制艺帖括，“游学海外，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①因而，他的自然科学修养就超越了许多同时代的先进人士。孙中山相当熟悉当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成果，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为他借以建立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其次，当时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十九世纪“经验的自然科学达到了如此的发展，并且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果，以致不但完全克服十八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成为可能，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因为说明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部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由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化，又转化成了唯物论的自然认识体系。”^②因而，也就便于孙中山直接地以自然科学的某些论断对宇宙的繁复事物作出哲学意义的阐释。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曾为孙中山所继承，并被填充以新的内容。例如，在哲学的基本问题方面，孙中山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解为传统的“体”与“用”的关系——以物质为“体”，而以精神为“用”；并把“太极”这个古老的概念赋以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物

① 按：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的这段自述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对于自然科学的主要部门——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有所接触，后来，这种学习也未中断，例如孙中山在一九〇五年旅居伦敦时，他就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优良学习条件，“……不懈地工作，阅读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产与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也占据了她的注意，而且细心和忍耐地阅读。”（参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和康德黎：《孙中山与新中国》。）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61页。

质涵义，以之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同样，王船山所阐发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的见解，也给予孙中山的卓越的认识论以积极的影响。应当指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固然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但在这个方面却与同代的许多哲学家（例如康有为和谭嗣同）有着不容忽视的区别，前者只是以古老的概念和哲学术语作为崭新内容的形式，而后者则主要是以片断的、朦胧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某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去牵强地比附与充塞传统的哲学观念。

由于孙中山是毕生参与革命斗争的战士，因而，沸腾的社会生活在他的世界观中留下了深刻而鲜明的印记，对于革命实践的理论概括则成为他熔铸哲学思想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例如，《孙文学说》这一著名的著作就主要是在总结与概括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字里行间所显示的革命先行者艰苦跋涉的履痕。革命实践乃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正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思想家的特色。

普列汉诺夫曾经写道：“时间在它的基本论点上安置了各色各样的上层建筑物，它使一个时代的唯物论较之另一时代的唯物论带上完全不同的面貌。”^①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论断。不同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会生长同样葱郁但却形态相异的思想嘉木，生活和战斗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孙中山正是循着自己独特的途径形成了哲学思想。两个重要而鲜明的特点赋予孙中山哲学思想以独特的面貌：其一，是近代自然科学以其原始的形态（即固有的、未经充分概括的论断）作为主要素材而被直接地移充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特别是自然观中间，例如，康德的星云形成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被直接地、未予充分概括地用作对于地球、有机界和人类形成过程的哲学意义的阐释；其二，对于革命实践的理论概括，成为孙中山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的重要源泉。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不断地提供大量素材，并且迫切地要求革命指导者给予理论的概括；而作为革命活动家的思想巨匠则不能不经常地倾听实践的呼声，并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完成实际生活所提出的任务。孙中山曾经为此付出艰巨的劳动，他的认识论的中心思想——“知行学说”就主要是对于革命实践概括的结果。正是如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哲学家们的世界观中最薄弱的环节——认识论却成为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坚实的部分。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乃是先进战士持之战斗的理论武器，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生存于其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乃是孙中山哲学思想所借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揉合着唯心主义杂质和带有粗糙的倾向。然而，作为近代中国先进的、启蒙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发生过革命的战斗作用。

正如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开拓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新阶段，孙中山的世界观也标志了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新时期：改良派哲学家的世界观如果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则无愧为——虽然它在很多方面带有雏形的意味——中国

①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1页。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开端。

(二) 方法论——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

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构成了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则构成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方法论的基本特色。中国近代先进思潮的共同特点——进化发展观念，在孙中山的世界观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儒家门徒所崇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观念；有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持有的形而上学的论点——把事物的变化仅仅归结为位置的移动、循环或单纯的数量的增减；又区别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哲学家所宣扬的披着“公羊三世”外衣的渐进思想；孙中山在观察、认识和阐释世界的过程中贯串了具有明确科学依据的进化发展观念。在他看来，宇宙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成为一个持续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进行着永恒的代谢、更替，不断地由简单的、低级的阶段上升到复杂的、高级的阶段。

孙中山认为世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可以分为“物质进化之时期”、“物种进化之时期”和“人类进化之时期”三个阶段。他把这三个阶段的内容简略地表述如下：“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前，……普通都说……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先，是一种气体。所以照进化哲学的道理讲，地球本来是气体，……日久凝结成液体，再由液体固结成石头。……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来源，地质学家考得人类初生在二百万年之内，人类初生以后到距今二十万年，才生文化。二十万年以前，人和禽兽没有什么大分别，所以哲学家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成，不是偶然造成的。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渐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①这里，孙中山实际上是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一些论断为依据，在自然界中贯串了发展进化的普遍概念，把地球、有机界和人类看作是在时间的长流中形成和涌现的事物。^②

同样，人类社会这种更为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也被孙中山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首先，孙中山把人类社会视作是宇宙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它属于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人类进化之时期”。其次，孙中山确认人类社会是在不间断地进展，他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作为准则，为人类社会勾画出一幅发展过程中诸阶段的更替轮廓：“民权之萌芽，虽在二千年以前的罗马、希腊时代，但是确立不摇，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乃是君权时代，君权以前便是神权时代，而神权以前，便是洪荒时代。”^③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2—663页。

② 按：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十分赞扬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自达尔文之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夫进化者，自然之道也。”他又推崇了古代希腊持有素朴的辩证法观念的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他们已有见及天地万物当有进化而成者，无如继述无人，至苏格拉底柏拉图二氏之学兴后，则进化之说反因之而晦。”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3页。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并非停滞不动，也不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一治一乱”的简单循环过程，而是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前进运动。人类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着纯粹的数量变化，而且还有着“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这些具有质差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

事物的进化发展乃是绝对的，而它的静止状态则只有相对的意义——这是孙中山所持的一个素朴的卓越见解。他这样写道：“在神权时代，非用神权不可；在君权时代，非用君权不可”，因为，神权和君权对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是“有用”的。显然，孙中山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客观真理，即是事物对于它所借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乃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因而它们在一定阶段内呈现为静止状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权”和“君权”逐渐丧失了它的“有用”的性质而变为“过去的陈迹”，在新的客观条件——“文明很进步，人类的知识很发达，发生了大觉悟”的基础上，出现了“民权时代”。^①这样，相对的静止状态就为绝对的运动规律所打破。

孙中山批判了把社会生活中的现象看作是“自古已然”或是“一成不变”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论断。他反对卢梭把民权的观念视作“天赋”，并且着重指出：“民权不是天生出来的，是时势潮流所造就出来的。”^②孙中山认为政治形式也都具有短暂的、不能永驻的性质，它们共有着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必然命运：“君权”在历史的进程中代替了“神权”，但它同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又为“民权”所更换。

孙中山坚信进化发展的规律乃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存在，任何停止或扭转历史车轮的企图和活动只是臆想和徒劳。他强调指出：尽管历史进程中经常发生迂回的现象，但进化发展则永远是它的基本轨道，社会历史正象长江大河的水流，它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③革命斗争是“顺应世界之潮流”的事业，即使革命力量目前还很软弱，并且在前进的路途上也难以避免“艰难顿挫”，然而革命斗争最终一定会获得胜利；反之，反动派的力量目前也许还很庞大，并且可能在与革命力量作斗争中取得一些胜利，然而，由于他们所维护的东西日益成为“过去的陈迹”，所以失败的结局终久不可避免。孙中山这样写道：“世界的潮流……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凯，很蛮悍的军队象张勋，都是终归失败。”^④孙中山就是这样以进化发展的观念作为理论依据，对革命事业的前途作出了自信和乐观的论断。

应当指出：人类的认识也被孙中山视为一个发展过程——“人类……由无知识而进于有知识，脱离旧观念，发生新观念，脱离旧思想，发生新思想。”^⑤在他看来，人类对于周围事物的认识乃是逐步由简陋而趋于完善。古代的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给予解释，但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68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68 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74 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74 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37 页。

“科学昌明”的今天却能够对于古代人们的疑问作出正确的阐述；但是，即使对于现代的人们而言，宇宙间的许多现象仍然是“不可思议者”，因为事物是无限丰富的。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指出了认识必须伴随着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否则认识就会在新的事物面前“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蹙。”^①总之，知识的“范围”是无涯的，而外在世界又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着的，因此，人类的认识即使今天已远远超过了古代，但这个过程却永远没有终结。

进化发展的观念曾经是近代中国先进哲学思想的共同特色，但是这个特色在孙中山的世界观中却表现出独具的面貌。与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的世界观相较，孙中山所持的进化发展观念的特点就清晰地显示出来：首先，孙中山的进化发展观念是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进行素朴的概括的结果，它由于拥有比较明确的科学论据而摒弃了神秘的外衣和奇异的色彩（这种外衣与色彩笼罩着康有为的进化观念）。孙中山服膺“证明自然界历史发展”的达尔文主义，认为进化论的出现是人类思想领域中的重大变革。他也赞同被恩格斯誉为使得“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②的康德的“星云形成说”，认为它正确地阐述了宇宙发生的过程。显而易见，这些科学成果成为孙中山的进化发展观念的基石。其次，如果说改良派思想家在他们的进化观念中所强调的主要是量变的渐进，而没有或只是朦胧地窥察到质变的飞跃；那么，孙中山却在承认量变的同时，也着重阐明了异质阶段的交接。^③毫无疑问，这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所奉行的政治路线。改良派以“通三统”、“张三世”的论点作为“变更成法”的理论基础，孙中山却把自己的进化发展观念作为革命地变革现实的思想依据。

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乃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的优秀组成部份，因为，“一般说来，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都有这个弱点，便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进化观念”。^④

（三）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观

恩格斯曾经写道：“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⑤这个最高问题乃是各派哲学家的最终分水岭：断言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基源的哲学家们组成唯物主义阵营；认为精神扮演着创世主角色的哲学家们则形成唯心主义阵营。孙中山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上给予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一系列重要课题上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路线。

与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呓语相反，孙中山在自己的哲学思想中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自

① 《中山全书》卷3第21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57页。

③ 应当指出，孙中山是反对庸俗进化论的。在与改良派论战时，孙中山曾经指出：“推彼之语，必先经立宪君主而后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也，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不过，孙中山的这种观念并未提到哲学意义的概括的高度。

④ 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第9页。

⑤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13页。

然观。他把世界看成是物质的，并且把宇宙的发生及其实质大略表述如下：“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①在他看来，作为万物的基源，“太极”这个古老的概念等同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关于“以太”的概念，而“以太”则是“弥漫六合”的、没有固定形态的物质，正是它构成了宇宙的本体。这样，尽管这种论断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并不确切，^②孙中山还是在世界的本质问题上采取了唯物主义的解释。^③

对于有机界和人类的形成问题，孙中山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他认为有机界和人类乃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们出现于宇宙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他所谓的“物种进化之时期”和“人类进化之时期”）。只是在地球形成之后并具备了某些条件，才出现了简单的生命现象，而人类则是简陋的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前者之化学有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分，今则已无界限之可别，因化学之技术，已能使无机体变为有机体矣！”关于生命现象的基础问题，孙中山依据十九世纪的细胞学说这样回答：“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命元始之意也。”^④在他看来，“生元”是构成一切生物的物质基础，是复杂的生命现象的本源。正如有机界一样，无机界乃至人类生命现象的基础也是物质。

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中考察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首先，孙中山把宇宙诸现象归结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基本范畴：“六合之内，一切现象，厘然毕陈，种类至为繁伙，……然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⑤接着，孙中山指出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1页。

② 孙中山把“以太”视为产生电子的原始物质，是因袭十九世纪的科学旧说。二十世纪初，随着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以及物理学家劳厄氏的证明，以太说已经破产。

③ 按：把太极解释为宇宙的本源，这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传统观念。但是，在同一的词汇下却包涵着相异乃至对立的解释。宋代哲学家邵雍曾对太极作了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论述，他在《渔樵问答》中写道：“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太极所生之万化万事，即吾心之万化万事也。”朱熹则把太极等同于“理”，奉为客观唯心主义的最高范畴。反之，明代哲学家王廷相则在《太极辩》中对它作了素朴的、唯物主义的阐释：“太极，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元始混沌清虚之气也。”在他看来，“气”、“元气”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孙中山对宇宙本源的论述是后一学派的继续，并把自然科学的新观念——“以太”填充到“太极”的概念中去。孙中山在具体地论述地球形成时写道：“推到地球没有结成石头之前，普通都说是一种流质。更在流质之前，是一种气体。”参证这种具体的论述，可以确知孙中山对太极——以太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事实上，他把这两个概念与气体（物质）等同起来。

④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10页。

⑤ 《中山全书》卷3第214页。

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①这段论述有着两点重要内容：第一，孙中山辩证地处理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精神是物质之对，二者乃是具有本质差别的两个范畴；另一方面，二者却又“相辅为用”，并非互不相关或彼此对立的两个实体。这样，孙中山就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作出正确的论断，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一般地反对了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主义的谬误。因为粗俗地混淆和抹杀物质与精神的差别，必然会堕落为被恩格斯斥作“唯物主义小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而把物质与精神理解为截然割裂的、彼此对立的实体，则会导致二元主义的错误倾向。第二，孙中山认为精神乃是人类独具的现象之一，而人类则是世界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人类进化之时期”）的产物；同时，世界上能够存在并且已经存在着“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虽然它们“必非人类”；此外，人类精神现象的依据——“体”，则是“属于物质”的“五官百骸”。这样，孙中山实际上达到了下列结论：精神现象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可以无需精神而独立存在，而精神则必需以人类的机体作为物质基础；物质是“体”，精神乃是“体”之“用”。这种结论否定了把精神奉为创世主的唯心主义观点，而贯串了把物质看作是第一性的、基源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后者是前者在一定发展阶段产物的唯物主义精神。

然而，在孙中山所持的唯物主义的见解中也包含着一些模糊观念和唯心主义杂质。这些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于物质与精神范畴的理解和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方面。

孙中山没有能够完全正确地把握物质这一哲学范畴。尽管孙中山企图对于物质作出哲学意义的概括，但是，他对于物质概念的理解并未超越出牛顿所开拓的物理学阶段的有关物质的阐释。在他看来，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于物质构造的学说并无本质差异，所谓物质则不外是“水”、“风”、“动植”、“武器”等等具体的物体。孙中山始终未能把关于物质构造的概念和关于物体的理解提升为哲学意义的物质界说，从而，也就不能清楚地认识物质乃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②显然，缺乏明确的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就不可能摒绝唯心主义的渗透和侵入，就不可避免地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上涂刷一抹晦暗不明的色彩。

同样，孙中山也没有十分确切地理解精神这一哲学基本范畴。“第知凡非物质者，则为精神可矣”^③——这就是孙中山为精神所规定的空泛的定义。孙中山没有理解精神、思维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乃是高度发展的物质——大脑所独具的反映外界事物的机能和属性。这样，他在解释精神现象时显得困惑，以致用低级的生物形态来解释人类特有的高级物质形态的属性，把精神现象的基础归结为生元：“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

① 《中山全书》卷3第2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8页。

③ 《中山全书》卷3第214页。

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①但是，“生元”本身仍然笼罩在奇异的迷雾里，以致孙中山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生元”缺乏了解：“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②甚至，把“生元”与孟子所谓的“良知”比附，牵强地宣称：“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③孙中山就是这样给生元披上了一袭带有神秘色彩的外衣，而把构成人体的每个细胞都赋以“知觉灵明”、“动作思惟”和“主意计划”的机能及属性。孙中山的这种论点表现出“新活力论”——“物活论”的消极影响，承认在单细胞产生的同时就具有了思维能力，当时，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在欧洲颇为流行。^④

既然孙中山对于物质和精神两个基本哲学范畴的理解不够确切，因而在论述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估计精神的作用时往往背离了唯物主义原则，把精神这个“能动的方面”加以“抽象地发展了。”^⑤这种情况在孙中山的哲学著作中屡见不鲜，精神的作用被提到独立的、甚至第一性的地位。孙中山曾经这样写道：“牛之力量大于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绳引牛，东则东，西则西，牛乃不能奋其一角与蹄以与童子抗，且甘心俯首唯命是听者，是则何耶？童子有精神，牛无精神。”^⑥显然，精神因素在这里被片面地渲染了。事实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积极地改造自然（包括役使动物），是因为劳动把人类提高于动物的状态之上，使得他们具有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产生了语言和思维，并且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展开广泛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地具备了精神的结果。同样，孙中山认为人若“猝然丧其精神”，既使“官骸虽具”，但因不能言语动作，以致“体亦为死物矣”。但是，精神的丧失乃是它的物质依据——“官骸”损坏的结果，而不是精神的丧失使得官骸变成“死物”，孙中山这种颠倒因果的论点，表明他未能深刻理解精神对于物质的依属关系。此外，孙中山还曾发表过“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⑦的论点，这种见解含有把精神作为主体，而把物质视作精神表现的唯心主义倾向。在《孙文学说》的序言中，孙中山甚至作出了极度夸张精神作用的唯心主义论断：“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者也，万事之本源也。”^⑧这里，孙中山简直把精神的作用高扬到现实的云霄之上。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10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1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10页。

④ 孙中山的这种揉杂着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生元”学说，是接受了德国病理学家微耳和观点的影响。微耳和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唯一形式和最小单位，人体是由细胞的砖石所造成的建筑物。这种论点是对细胞学说的歪曲，为之输入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私货。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微耳和学说在生物学、医学、生理学领域颇为流行。孙中山未能窥见微耳和学派的反科学性质，甚至在《孙文学说》中还赞扬他和他的“生元有知”的学说。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⑥ 《中山全书》卷3第216页。

⑦ 《中山全书》卷3第214页。

⑧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5页。

孙中山的上述观念与他的唯物主义见解处于矛盾的状态，它们构成了孙中山的世界观中的消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又一次论证了列宁的断语：“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①

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先进思想的理论基础大抵采取了唯物主义或接近于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而作为这一路线的基本特征，则是在自然观中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吸收和接受。孙中山的贡献在于把这种吸收和接受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虽然未经充分概括的、但却系统而明确的自然科学成果直接移作自然观的组成部分。这就使得孙中山的哲学——特别是自然观获得了崭新的形态，不仅超越了我国古典哲学的阶段，而且脱出了康有为的阶段——康氏及其门徒们在熔铸自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经常把片断的、朦胧的自然科学知识硬塞在传统的古老概念和学说里，因而，使得这一哲学思想的某些部分闪烁着神秘模糊的色彩。

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大抵存在着夸大精神的作用和意义的倾向，这个特点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罪恶统治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의 沉寐精神状态，因而唤起他们、促成他们的觉醒就成为先进人士必然关注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思想的阶级基础的特性——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上述特点。当着这个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进行变革现实的斗争时，由于自身的孱弱以及缺乏与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阶级）的密切联系，往往痛感没有足资凭借的强大社会物质力量，便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夸张精神、心灵和意识——主观因素的作用。康有为的“电——知”就是这样，谭嗣同的“以太——心力”更是如此，孙中山的“生元”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它们吹胀主观因素的作用，并以奇妙色彩涂抹主观因素。不过，孙中山在这里毕竟使得这种唯心主义成分减少到相当限度——资产阶级的特性所能容许的限度。所以，如果说康有为和谭嗣同经由“电——知”和“以太——心力”而走入唯心主义的迷宫，那么，孙中山的“生元”观念和夸大精神作用的论断则使得他的哲学思想丧失了彻底的一元论性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二元论”的倾向。

（四）素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孙中山哲学思想中最为卓越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位民主主义战士对于中国哲学史所作的杰出贡献。孙中山所持的认识论基本内容包含在“知难行易”的学说中，它的特色在于把“行”——实践提到首要地位和强调“真知”——理性认识获得的困难与必要。孙中山在认识论中着重地概括了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为他后期的思想跃进准备了理论基础。

孙中山的认识论立基于两个论点之上。首先，客观存在被视作第一性的，而认识则被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4页。

视作第二性的；前者是被反映者，后者是反映者。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宇宙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而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比方陆军的战术学，现在已经成了有系统的学问……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① 确立这样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前提具有严重的意义，唯物主义哲学——如同列宁所指出的——就是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② 其次，孙中山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关于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纷纭复杂的现象都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孙中山固然承认“智之范围甚广，宇宙之范围皆为智之范围”，^③ 但却明确地指出，即使是“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的现象，都能够“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着“尚非人类今日知识所能穷”^④ 的未被认识之物。

这样，孙中山就与唯心主义和不可知主义划清了界限，并把认识论放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孙中山在自己的认识论中把“行”——实践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极度强调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行”——实践具有广泛的可能性（“行易”），它是人类认识乃至人类进化的重要手段。孙中山这样写道：“且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者，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⑤ 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孙中山的上述见解包含两点重要内容：第一，“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人们在“知”——认识事物之前，可能而且已经在“行”——实践，不知而行不仅是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还是人类认识和进化的必要“门径”；第二，“行以致知”。孙中山认为人们在“行”——实践的过程中可以获取关于外界的知识——“知”，“行”——实践乃是由“不知”而“致其知”的途径和手段——“能实行便能知”。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由实践产生认识，这就是孙中山的上述论断中的精萃所在。

孙中山在《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中，对于“知”“行”问题，特别是“知”的源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概括地指出：“约言之，智有三种：（1）由于天生者；（2）由于力学者；（3）由于经验者。”^⑥ 应当指出，孙中山在这里所指出的第一个“知”的源泉——“由于天生者”，并非意味着人类具有“先验的理性”或“天赋观念”，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泛指人类的天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71—6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61页。

③ 《中山全书》卷3第219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9页。

⑤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2页。

⑥ 《中山全书》卷1第219页。

禀资质——“凡人之聪明，惟为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别。”^①因为孙中山还曾一再论证过人们是“不能生而知之”的，必须“学而后知”。此外，孙中山也没有过分夸大天禀资质对于认识的作用，他在同一演讲中指出：“甲乙二人，甲聪明而不好学，乙聪明虽不如甲，而好学过之，其结果，乙之所得，必多于甲。”^②不过，孙中山在这里把人们的天禀资质与认识源泉混淆地并列，不能不在“知”的来源问题上抹饰了一笔“先验的”唯心主义色彩。然而，孙中山所谓的认识源泉主要地只能归结为“力学”和“经验”：“力学”能够“集合多数人之聪明，以为聪明”，不仅可以“取法现在”，并且可以“尚友古人”，这是间接经验；“经验”则意味着“所历之事日多，知识虽已增长”，这是直接经验。这样，孙中山就在自己的认识论中作出了把“行”（实践）视为主体通达客体和反映客体的桥梁，是“知”（认识）的主要源泉和基础的唯物主义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摈斥了主张在认识领域中“返求诸己”或到“绝对观念”和“先验理性”里去探求真理的各色唯心主义观点。

在论述了“知”、“行”关系之后，孙中山又对“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认为人们从实践中所获得的“知”有着“真”、“伪”之分，并非所有的“知”都是“真知”或“科学的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③例如，古代人们所持的“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以及“俗呼养子曰螟蛉，盖有取于蝼蚁变螟蛉之义”^④的概念就是错误的；反之，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有关宇宙和蝼蚁以螟蛉作为自己幼虫的食料的认识则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前者有悖于客观实际，因而经不起“科学按之，以考其实”的检验；后者符合于客观实际，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孙中山就正确地阐明了真理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主要标准的唯物主义论断：“学理有真的假的，要经过实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如象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作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理。”正是这样，孙中山着重地强调了获得“真知”的困难，并以很多实例力求论证这点；同时，孙中山也指出虚假的知识是无意义的，只有“真知”才能够对人们的活动发生积极作用。

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不能停滞的，因为人类的认识所反映的外在世界永远处于运动、发展和变化的状态：“吾人之在世界，其知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蹙。”^⑤孙中山的这个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把某种人类思想体系理解为具有绝对的性质和最终地、完全地认识世界的陈腐哲学狂想，而把人类的认识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持续过程，它的每一停顿都意味着落后于客观形势。显然，孙中山所持有的这种具有辩证因素的见解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为人们必须适应事变进程而不断扬弃旧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孙中山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上述观念，他本人就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地不断进步的典范。他在晚年扬弃了旧三民主义政纲，而使自己的

① 《中山全书》卷3第219页。

② 《中山全书》卷3第219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6页。

④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6页。

⑤ 《中山全书》卷3第219页。